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五

甲午戰爭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五

甲午戰爭

翁萬戈 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甲午戰爭／翁萬戈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4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五)

ISBN 978-7-5476-0896-8

I. ①甲… II. ①翁… III. ①中日甲午戰爭—
研究 IV. ①K256.3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71606 號

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五

甲午戰爭

翁萬戈 輯

策 劃／徐忠良 責任編輯／徐忠良 劉麗娟 裝幀設計／李 廉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

地址：中國上海市欽州南路 81 號

郵編：200235

網址：www.ydbook.com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上海遠東出版社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製版：南京前錦排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刷：崑山亭林印刷責任有限公司

裝訂：上海文藝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889×1194 1/橫 16 印張：37.75 插頁：4 字數：302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0896-8/G·633

定價：300.00 元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舉報電話：62347733)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向工廠調換。

零售、郵購電話：021-62347733-8538

《翁同龢文獻叢編》新版序

《翁同龢日記》及《翁同龢文獻叢編》是我高祖翁同龢留下的兩大原始歷史資料。《日記》最全、最確的簡體字排印本在二〇一二年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全八冊；而《文獻叢編》雖在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三年五年間由臺北藝文印書館以影印方式陸續出版，但不易達到全國的讀者。現在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徐忠良先生主持下，將發行新版，我不勝鼓舞，樂為之序。

一、《文獻叢編》六集八冊，其第一集《新政·變法》是為應合常熟翁同龢紀念館在一九九八年紀念戊戌百周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開會時贈送參加的人士首先出版的。其餘五集七冊，大致按其內容與時代列次。為了介紹每集的內容及加深讀者對其瞭解及認識，我敦請了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孔祥吉、故宮博物院朱誠如、山東社會科學院戚其章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王道成四位學識深廣的近代史學家為《文獻叢編》相應各集撰寫序言。他們的思想、評論、意見，已成為《文獻叢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此請讀者特加注意。

二、翁同龢的簡歷、翁氏家藏文獻的形成，我之以玄孫身份繼承遺產，而受到幾代先人的教養，得以保存這些歷史文獻，已見於《緣起》。其中也包括我對各位親友賜助的至誠謝忱，茲不贅述。現在願補充一下個人在救護、保存、整理、發表這份不平凡的遺產時的衷心的感念。我並沒有學歷史，但敢於承此重任，全靠「家教」。四歲入私塾時，老師大概都是前清的舉人或秀才，教授法很單純，就是背書。第一本是《詩經》，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繼之為《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節選的《史記》《漢書》，一直到《古文觀止》中自東周到明末的散文名篇。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本生父親翁之憲（一八九六一一九七二）因職務變動由天津遷到秦皇島。我們三兄弟（大哥開慶，二哥傳慶，我行三，原名興慶）的家庭教師受過新教育，能畫地圖，使我們除傳統的國學外，也略知地理、數學等科目，這也使我們在一九三〇年回到天津後，可以入新式的初中學校。兩位兄長入了北平（即北京）

匯文中學，而我因年幼，留在家中，入了新創的天津公學第一班初中（今耀華中學）。那時的國文教員鄭炳勛（字菊如，一八六七—一九五四）站在我的座位前注視我作文寫字，非常賞識。到了高中一年級，我加入了北平匯文中學大哥、二哥的一班，在教師鄭騫（字因百，一九〇六—一九九一）的訓導下，鑽研文史，同時在圖書館裡大量閱讀『五四』運動後的白話文學，從胡適、魯迅等到巴金、沈從文。到了一九三六年考大學的關頭，除得到保送燕京大學（今并入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外，又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劉敦楨教授主持的建築系，而父母及過繼的母親強春卿夫人（她的丈夫翁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在一九一九年去世前選我為嗣，使我成為翁同龢的玄孫）認為上海離常熟近，我應該試一下當時最難考入的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考畢自查物理、數學兩項——學工程的基本科目，我只各得了六十分，沒有希望被錄取。想不到的是考國文的題目《周易以上古製器物者為聖人論》對我沒有問題，兩小時時間我憑空寫了一篇文章，竟得到交大國文系主任陳柱（字柱尊，一八九〇—一九四四）的青睞。他是那時交大校長黎照寰（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好友，他提出招生的人才主義，把我收入交大。可是這意外的機遇，對我並不完全合適，因為我的興趣不在工程。在交大的兩年，我學習成績猛進，得以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後，從上海租界乘船赴美，轉入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而且只再念了兩年就獲得了碩士學位，然後在紐約擔任了幾個月的工程職務。到一九四〇年底，我決心放棄工程，重回到文學、歷史、美術的領域，而主要服務範圍當然是偉大的祖國。

三、上述是我從事整理家故的基本準備，但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學習、修養及經歷是在故鄉常熟的生活體驗。我本生父母同過繼的母親對我的教養有明確的安排，即一切教育到高中畢業，都是跟隨兄長，在天津與北平；只有家庭大事，在我負有『孤哀子』『承重孫』等頭銜的時候，纔回到故鄉，執行典禮。在那些日子裏，我就住在綵衣堂，其大廳仍是明代建築，全部房產是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為孝養母親在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購置的，取老萊子綵衣娛親的故事而名。我依稀記得在只有幾歲的時候，住進了綵衣堂大廳後的房間；而那時常熟仍在『中古時代』，沒有電、自來水、柏油路及一切近代的設備，只有煤油燈、馬桶、井水、拱橋、轎子。大堂的門檻高，幾歲的孩子必

須爬纔能過去。後來回鄉多次後，發現隨着時代的不斷進步，這裡除了水、電、洋車之外，還仍然保持了一些晚清風味，譬如木船。有一次，我陪着過繼的母親（『好娘』）從綵衣堂的後門上船（船分首、尾、中、後艙數部分），由前後兩名船夫撐竿、搖櫓，一直乘行到上海。我睡在中艙的板床上，一夜聽水聲在枕底，其風味至今尚念。又如我十幾歲時，『好娘』爲我雇了一隻小船，整天遊虞山下的西湖，午餐也由船夫供應。每到一個景點，就停船上岸觀賞，使我憶及高祖在他日記中描寫的各洞、岩、寺等名勝……這也是我編輯這部《文獻叢編》的經歷準備。

四、一九四一年尾，日軍突襲珍珠港，美國聯合中國向侵略者開戰，我以既有中國方面的知識又具電影的技術獲邀參加美國軍部的特殊電影機構，編製『我們爲何作戰』系列中《中國之戰》一片。影片接近完成時，又被聘爲美國國務院的顧問，利用羅斯福總統緊急款項，特創了譯製美國電影送到戰時陪都重慶，藉以溝通兩國間的瞭解。這項工作持續了三年，而我也自然地變成了留美的華僑。但我不斷地與祖國聯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我仍推進電影事業，而且有機會在紐約結交了美國政府邀請的中國文化界名人——孫瑜、老舍、司徒慧敏、葉淺予、戴愛蓮，而且同後三位合作拍攝了十分鐘的短片《中國民間舞兩種》。之後司徒先生加入了我的小組：中國在美電影企業公司。這對我在一九七九年回新中國後的文化活動有莫大的幫助。書歸正傳，對於在美國安全保存翁氏家藏古籍、書畫及文獻的工作，最重要的人物是我已故的老伴程華寶。

五、一九四三年，當我爲美國國務院譯製解說美國情況的電影時，得到資金創作新片，包括拍攝《鎔美鑄華》——介紹中國學生在美留學情況，從晚清的容闈（一八二八—一九二二）到二次大戰期間的同學。此片規模較大，於是我回到自己學習電影技術的紐約哈蒙基金會（Harmon Foundation），請其主持，包括聘用已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分任寫作、攝影等工作。留學生一共三人，包括剛從著名女校布林茂爾（Bryn Mawr）英國文學系畢業的程華寶。她負責搜集資料，接洽被選入內容的機構、人物，以及編寫影片的解說詞，等於做我的第一助手。在天天面談商討的情況下，兩人發生愛情，在一九四四年結婚，婚後仍然是密切合作。日本戰敗後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兩

黨的內戰；我在紐約的企業當時發展相當順利，很難抽身回國，但華寶決心回上海省親，在一九四八年春間攜三歲女兒以思乘船先歸，當然我立即追隨，在同年六月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 DC-3 飛機自紐約飛抵上海。拜見華寶父母後，我們三人先謁「好娘」，然後北上天津看望我的本生父母及兄弟、姊妹和侄兒、侄女。馬不停蹄，我同華寶到了北京，拜訪表親王錫桓夫婦，被邀晚餐時，碰到了國民黨自遼寧敗退的兩員軍官，坦陳蔣介石在軍事方面大勢已去。第二天我就同華寶回到天津，將存放在該地長期租房中的「家藏」選擇包裝（由我本生父母及大哥翁開慶大力協助）。安排華寶及以思坐火車回上海後，我帶着「家藏」搭乘開灤礦務局的小運煤船南下，抵滬後將「家藏」都集中於「好娘」在上海所租的「弄堂房子」裡。八月間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造成空前的通貨膨脹。到了十一月，我帶着華寶，以思坐上最後一班由中國飛美國的西北航空公司飛機回到紐約。而「家藏」則在事前安排航運——到達時間的懸殊使我及華寶夜不安寐長達一月之久。終於，十二月十八日得到安全運達紐約的船運公司通知。

六、爲了確保最高等級的安全，我倆立即在紐約出名的儲藏大樓租了一間防濕防火防盜的庫房，將「家藏」保存其中。經過了二十八年，我們決定自紐約遷到美國東北角新漢普沙州（New Hampshire）的小鎮萊姆（Lyme）的一片位於小山半腰的林中醫住；自己開闢園地，在一條小溪旁建造房屋，稱「萊溪居」。除珍貴的書畫存入附近的銀行保險箱外，大部分文獻都存放在自己設計、營建的書房畫室中。一九九七年初，得到臺北藝文印書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的同意，開始《翁同龢文獻叢編》的出版工作，而編輯工作繁重的細節就是把文獻原稿一頁一頁地複印，寄到臺北去設計、印刷。這種極其需要聚精會神地心手相應的工作，都歸了華寶。她在我們自備的大複印機旁，不辭勞瘁地站着一頁一頁地操作，尤其注意那些已經破爛或極脆弱的原件。她的功績不見於這全部《文獻叢編》六集八冊的任何表彰。念及她已在二〇〇三年去世，同我合作近六十年，留下的著作不止於此，我怎能不潸然淚下！

撰寫此序時，不免仰首看到牆上懸挂的高祖所書四扇屏，寫給我本生祖父斌孫的「三弟順孫（字寅臣）」，顯然是大字的訓言，節錄如下：

近來為學何如，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海外亦粗有經籍……姪孫應熟看前後漢史、韓柳文。

壬辰夏五為寅臣姪孫 瓶叟（時合一八九二年六月）

我們家傳的歷史感，就是我編輯出版這部《文獻叢編》的動力。

翁萬戈寫於萊溪居

二〇一四年一月，時年九十五歲又半

緣起

在十九世紀入後幾十年中，以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鴉片戰爭為歷史上的分水嶺，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急劇地走下坡路，每況愈下地陷入了甲午戰爭（一八九四）的莫大危機，使有頭腦有熱血的朝野人士認清了只有變法圖強，纔可以免於亡國之禍。在這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中，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從一甲一名進士出身到兩任帝師，歷官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參與了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危的重大決策，終於在戊戌變法的前夕，被開缺回籍，結束了四十二年的從政事業。身為晚清政局的中樞分子之一，他鞠躬盡瘁地設法保全國土，改變頹局，但崩潰的大勢遠勝於革新的志願和努力。這位近代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終不能免為突出的悲劇性人物。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教材分經、史、子、集四大類，而史是骨幹：經裡不能無史，子、集更不能脫離史。翁氏精通史學，而且以史為教授皇帝的主要工具。他深深體會歷史的意義，所以一生記錄極勤：最特出的是他的日記——自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五八·七·三十一）到光緒三十年甲辰五月十四日（一九〇四·六·二十七），幾乎整四十六年，包括了他整個從政時期及罷黜後的六年，在他逝世前六天纔絕筆。這部第一手歷史資料在乙丑年（一九二五）由張元濟先生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七三年據此縮印），在一九七〇年臺北趙中孚先生曾編輯此日記的排印本，後來北京中華書局陳義傑先生又點校新的排印本，陸續出版。在中法越戰期間，他受命初次入軍機，加寫《軍機處日記》：起自光緒九年二月初一日（一八八三·三·九），訖於次年三月十一日（一八八四·四·六）；在一九三八年由收藏者燕京大學圖書館影印出版。其實，除這兩部日記（一大一小）之外，他還留下了大量的文獻：隨手記、奏稿、議摺、信件、輿圖及他經手負責的他人奏摺、說帖等等。這些若非他的手迹，就是他過目的文件，總之，都是第一手資料，值得近代史學者的探索與參考。不過這些文獻分散在各處，近百年來損失的數量也必可觀。除去已歸公有的圖

書館、博物館及檔案館的那些資料之外，恐怕最大的一部分就是『翁氏家藏』的這一組。而這裡所謂『翁氏家藏』的範圍，需作下述的解釋。

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又號瓶生及瓶廬，晚年常用松禪，謚文恭，所以他的著作、書畫在出版時，常標『翁文恭公』、『翁松禪』或『松禪老人』。他的父親翁心存字二銘，號邃菴，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為同治帝師，卒謚文端。長子翁同書（即翁同龢長兄），字祖庚，號藥房，官至安徽巡撫，卒謚文勤。次子翁音保，早卒。三子翁同爵，字玉甫，官至湖北巡撫。翁同龢最幼，無子，由同爵子曾翰嗣；曾翰的長子安孫又無子，由同書的曾孫之廉嗣；之廉無子，由同書的玄孫興慶嗣——而我就是興慶，自號萬戈。因此，我的本生世系是高祖同書，曾祖曾文，祖斌孫，父之憲；而族譜上的世系是高祖同龢，曾祖曾翰，祖安孫，父之廉。在中國的社會制度下，我繼承了松禪老人的遺產，包括故鄉常熟、書畫，以及前面所述的文獻。我生於一九一八年，而次年我過繼的父親之廉，即我的二伯父就去世了，這些『紙頭紙腦』的遺產就一直保存在我過繼的母親（即我的二伯母）在天津長期租用的房子裡。但她主要住在常熟綵衣堂，其中仍有不少文物。自一九三七年日本發起全面侵略戰爭以後，我們到上海租界避難，綵衣堂就不再是住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它被改為傷兵醫院，其後又經過『文革』，堂內所藏的什物與資料基本上毀散無存。我在一九三八年從上海交通大學轉到美國普渡大學，畢業後從事教育電影工作，一九四八年重返故國，在天津初次檢點由松禪老人傳到我的這一部分古籍、書畫及文獻，裝箱運上海，然後在接近年終混亂的局面下，由海運到了美國。這批文獻基本上就是本叢編所指的『翁氏家藏』，可以說是狹義的『翁氏家藏』。

在此必須提起另一組翁氏家藏的翁氏文獻，一向保存在我本生高祖同書一支的家裡，其原來的數量相當可觀。尤其是因為祖父斌孫是松禪老人得意的侄孫，所以他得到不少珍貴的家藏善本悉數捐獻，其中也有很多翁心存、翁同書及翁同龢撰寫、熙曾兩先生所選的家藏善本悉數捐獻，其中也有很多翁心存、翁同書及翁同龢撰寫、編輯及批注的文獻和稿件，例如翁心存撰《知止齋遺集》二十二種稿本，共一百十一

冊，及翁同龢輯撰的《瓶廬叢稿》二十六種稿本，共三十冊。那時我大哥開慶侍父在場，他還記得父親談及常熟綵衣堂夾壁中尚有藏書，可能幸免兵燹；趙先生當即前往搜尋，聽說有所收穫，也歸入北京圖書館。這些當然已不在現在「翁氏家藏」範圍之內。至於父親留下的少數祖先遺迹，又受到「文革」時的抄掠破壞。即使如此，還有一些歸還到開慶兄及永慶、銘慶兩弟手中，如殘存的《松禪年譜》（自訂）及松禪老人寫給斌孫的很多封信。這一部分「翁氏家藏」的殘餘，在適當的地方可能也用在本叢編之內——自然要標明目前的藏主。

現在要談到整理「翁氏家藏」翁同龢文獻的過程。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這三十年中，我在紐約一家最安全的儲藏庫裏租了一間小儲藏室，安置這些久存天津的先人遺物。然後我決意脫離城市，在美國東北角的新漢普沙州一個萊姆小鎮的山間自己設計建造屋舍；小溪映帶，因稱「萊溪居」，而基層全部是藏書及工作之所，具備了展開文獻從事整理的條件。一九七九年在去國三十一年後初次有機會重返故土，在天津和北京與闊別的開慶兄、永慶及銘慶兩弟歡聚，在常熟又踏上了綵衣堂的門檻。回憶我兒時一直受本生父母的教養，在私塾與開慶大哥（長我三歲）、傳慶二哥（已故）同學，到了北京匯文中學高中又同學三年，時常一同工作，於是提議請大哥大嫂到萊溪居小住數月。第一次在一九八一年，我們開始整理家故的工作，但進展不多；第二次在一九八九年，努力完成了總目錄；而主要的是在第二次一九九六年，從六月起，大哥差不多每天都翻閱、檢點、分檔，而且有些比較重要的項目，他把稿本的行草書「譯」成正楷。這樣持續了約六個月。所以這叢編的基本整理工作，是開慶大哥的功績。

關於編印本叢編的構想，我懷之已久，但總達不到成形的地步。一九九四年五月下旬，常熟市政府和中國史學會聯合主辦了「甲午戰爭與翁同龢學術討論會」，以紀念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百周年及翁同龢去世九十周年。我在會場上發表一短篇《翁氏家藏文獻述略》，報告截至該時這組歷史資料部分公開發表的情況和日後規劃進行的工作綱要。這個可以簡括為下列三條：

（一）供國內外一些專家學者利用，以書及雜誌的方式發表，例如謝俊美

教授的專著《翁同龢傳》；

(二) 以影印方式將原稿整理成集後陸續出版，這是繼先父經手影印《翁文恭公日記》《瓶廬叢稿》等之後的工作，以供學者研究；

(三) 以專著的方式編印《翁同龢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代書畫集》《翁同龢所收古籍善本目錄》等。

顯然，本叢編就是上述第二條的具體實現。

綜觀全體資料，大致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從政方面，一是個人及家族方面。而本叢編只限於前者，把後者留待異日處理。再分下去，從政方面的資料可列為六集：

- 一、考試及國子監
- 二、內政·宮廷
- 三、中法越南問題
- 四、甲午戰爭
- 五、中德、俄、英交涉
- 六、新政·變法

從這六集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半是應付列強的侵略壓迫，而最後一集則達到變法圖強的覺醒。明年是戊戌變法的百周年，所以首先編印《新政·變法》這一集，以資紀念。其他各集，當陸續出版；因每集的內容有其獨立性，所以并不一定按照以上的次序與讀者相見。我去國將近六十年，學識有限，幸得許多益友之助，纔能擔起這件工作；可是錯誤難免，敬希賢達指教，以備在日後改正。

最後，我特別感謝下述幾位對我的鼓勵與幫助：家兄翁開慶的整理標目，是完成叢編的基礎工作，我在前面簡略談過。他在萊溪居時孜孜不倦，日復一日，我們一齊研究、探索，恍如童年及少年時代同窗之樂。雖然多半時間我們遠隔太平洋，但在頻繁的書信中，也不斷商討這些整理家故的事項。可以說，這部叢編是我們兄弟合作的

成果。其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孔祥吉先生，他對戊戌維新運動有專著，目前被邀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從事專題研究，使我有機會時常請教。《新政·變法》的資料編排得到他的改正，同時又蒙他賜以長篇前言，談及這些文獻的重要性，使積塵百年的舊紙，充滿了適於古為今用的生活力。然而，像本叢編這種題材比較專，規模又相當廣的文稿，很難引起出版家的興趣。藝文印書館有此見識魄力，毅然接受，這不得不歸功於該館主持人嚴陳鳳嬌女士——嚴一萍夫人。我的故友嚴一萍先生既是甲骨學專家，又是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企業家。他在一九五二年創辦藝文印書館，所印《百部叢書集成》，是中文圖書館必備的重要參考資料。我有幸在一九六八年得識嚴先生，合作影印我家藏的《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結交以來使我深佩他以學者精神來發展文化事業的志願及成就。他在十年前逝世後，嚴夫人繼其遺志，同樣地為學者服務；今春我們在臺北商談本叢編的計劃，她明快地分析綱要及細節，提出具體進行方式，毫不遲疑地擔起了出版的責任。我既欣愉又欽佩，在此謹申由衷的謝忱。

一九九七年秋葉將紅時翁萬戈誌於萊溪居

《甲午戰爭》序

戚其章

一九九四年五月下旬，「甲午戰爭與翁同龢學術研討會」在江蘇省常熟市召開，我有幸接到邀請，帶着濃厚的興趣前去參加。過去從未舉行過有關翁同龢的會議，這是第一次學術研討會，引起史學界的廣泛關注。翁氏後裔翁萬戈先生也從美國專程趕來與會，并向會議提交了《翁氏家藏文獻述略》一文。我讀後感到翁氏家藏文獻內容豐富，確有重要價值，應該整理出版，便以此向翁同龢紀念館館長朱育禮先生建言。一九九八年八月，翁萬戈先生所整理的《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一 新政·變法》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從此集的《緣起》中得知，《叢編》將編為六集分冊付梓，《甲午戰爭》亦其中之一集。

今年春天，翁萬戈先生自美國來信，告以《翁同龢文獻叢編之五 甲午戰爭》編訖，邀我為此集作序。我覺得此集之出版，對於推動與深化甲午戰爭研究必將產生重要的影響，為之作序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我也想及早讀到這集文獻，因為腦子裏長期形成的許多疑團得不到破解，希望從翁氏家藏文獻中能夠找到答案。我研究甲午戰爭的時間不算短，從上個世紀五〇年代中期開始，迄於今天，除「文革」期間被迫中斷外，其他時間都未放棄此項研究。儘管如此，對於研究中所涉及的許多問題，仍難免時興史料不足徵之歎。如對於甲午戰爭時期清政府最高決策層情況的研究，即缺少關鍵性的第一手資料。這就是我為什麼急於閱覽此集文獻的主要原因。

攤開翁萬戈先生寄來的此集文獻複印件，一頁一頁地翻閱着，果然不負所望，猶如走進一座豐富多彩的史料寶庫，滿眼是琳琅珠玉，令人目不暇接。正如袁枚《隨園詩話》有云：「盡半日之暇，為之翻擲，見其鴻富，美不勝收。」尤為興奮的是，原先積存在腦海裏的種種疑問，有不少從中得到了答案，從而第一次真正接近了這些長期撲朔迷離的歷史真相。茲略述如次：

第一，戰爭初期朝野上下曾發生過一場「速戰論」與「持久論」的激烈爭論，這對清

廷最高決策層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

衆所周知，早在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開始執行一條對外軍事擴張的方針。從一八七一年起，日本在大力擴軍備戰的同時，還不斷向中國派遣間諜，分布於中國全國各地，從事搜集情報的工作，『或察政務之設施，或考江山之形勝，無不瞭如指掌』。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陸軍大佐先後兩次親自來華進行廣泛調查，於一八八七年寫出了著名的《清國征討方略》，主張抓緊對華作戰的軍事準備，一旦時機成熟，『斷然先發制人』，『攻占北京，擒獲清帝』。日本參謀本部預測到進攻中國勢難避免，便有計劃地在陸海軍內部組織討論未來對華作戰之構想。從此時起，日本當局對準備日後發動侵華戰爭時採取『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便逐漸形成了共識。

然而，對於日本亡我之侵略野心，中國方面一直未引起高度的警惕。從一八九四年六月上旬日本軍隊大規模進入朝鮮，到七月二十五日不宣而戰襲擊中國海軍，再到八月一日中日兩國宣戰後的一段時間內，在清政府內始終未能形成統一的禦敵方針。且不說朝臣中主和與主戰之爭持續不斷，即使在主戰派內部，也存在着『速戰論』與『持久論』之爭，而且這一爭論到戰爭後期仍未停息。『速戰』與『持久』兩種主張，究竟哪一種正確呢？

先要瞭解西方國家是怎樣看的。當時英國政府最關注這個問題，曾命海軍部情報處提出報告，內稱：『不管從哪個角度講，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卜的……總的來說，他們都是缺乏訓練，沒有組織，沒有合格的指揮人員。因此，在現有條件下，中日如果交戰，只能有一種結果。』并指出：『中國要想取勝日本，只能通過大幅度拖延時間，譬如說兩年或三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也做過預測：『日本在這場新戰爭中，料將勇猛進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國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戰術，但是只要它能經得住失敗，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數上的優勢轉移局面，取得最後勝利。』還特別強調：『中國如能發揮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內可以取勝。』其他一些西方人士也有類似的看法。可見，從客觀上看，都認為中國應該采取持久戰的作戰方針。

當時，在清朝官員中，也不是沒有認識到對日軍實行持久戰略的必要性。如南洋

大臣劉坤一，早在戰爭爆發不久即主張對日軍的攻勢要「以堅忍持之」。後來更明確提出：「持久」二字，實為現在制倭要着。『還有些官員也認為：「與倭人抵死相持，百戰不屈，百敗不撓，決之以堅，持之以久。』兵貴持久，乃能制勝。』這些言論雖然深中肯綮，確為勝敵之良策，却在激越高昂的『速戰論』聲浪中被淹沒了。

由於當時的中國人大多數并不真正瞭解外國，難以做到『知彼知己』，所以『速戰論』一時在朝野成爲時髦的主張，在主戰議論中占有主流的地位。他們總認爲日本乃『彈丸小國』，人力財力有限，外強中乾，且士兵未經大戰，不難『一鼓得手』，『指日蕩平』。『速戰論』者在戰略上藐視日本侵略者，并不爲錯，但在認識上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認爲速戰即可速勝，在戰術上犯了輕視敵人的錯誤。不過，主要的問題在於：在這場『速戰論』與『持久論』之爭中，樞府袞袞諸公究竟持何種態度？

對此，從翁氏文獻不難找到明確的答案。此集中有許多『速戰論』資料，都是清宮檔案或其他文書中所未見的。例如，兵部主事傅雲龍所上議題曰《機勢在速議》，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內稱：

而今之機勢，則無論戰否，中國之利在速。不速，則彼之戰艦不止十增其六；不速，則彼之扼要不止十里一營……彼初不料我之主戰也，主戰則彼萬萬不肯遽戰，而又萬萬不言不戰。此非徒以老我師，蓋將有以彌其隙。彼多一日經營，則我少一分把握。與其讓彼以從容，孰若運我之籌算？……迨至彼可決戰則戰，適入其術中矣。即使決戰，而勝算未盡操之我。

此集還有一冊《倭事雜記》，係翁同龢對某些封奏、信函、說帖的摘錄，頗值得注意。蓋所摘錄的多爲『速戰論』者的建議。如翁氏摘錄編修張孝謙摺的要點云：

破常格以備攻剿。論日本形勢，謂宜練徽之穎毫、蘇之海徐、浙之寧台、閩之漳泉、粵之嘉潮凶悍徒卒，許令效力，以不次之官、不貲之賞，令竟由閩廣徑渡橫濱，或繞東北由新瀉登岸……但得數萬人登岸，直指東京，彼即全局震動。

『速戰論』提不出什麼克敵制勝的具體措施，只能設想採用『奇攻』的辦法以獲得速勝。

翁同龢的門人張謇也是一位『速戰論』者，他在戰爭爆發前後曾致翁氏秘函數十

通，其中也不乏速戰之論。對此，翁氏亦感興趣，加以摘錄。其一云：

飭北洋駐威海，援朝鮮，一面飭東南各省派兵船分道徑薄日本，以臺灣為後路；一面起劉錦棠，募哥老會二三十營，許其自新。

其二云：

請中國可戰鐵船共二十餘只，約分四隊，每隊五六船，游弋於中國、朝鮮、日本之間，遇便則或毀其船廠，或沈其戰船。

「速戰論」者愛國之情可掬，動機是好的，但其主張是完全脫離實際的，絕對行不通。翁同龢在《倭事雜記》中摘錄了許多「速戰論」的主張，而惟獨不涉及「持久戰」的言論，便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傾向。翁氏身為帝師，是帝黨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觀點對戰爭初期的清廷禦日方針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隨着戰事的進行，帝黨主戰派的這一套辦法處處遭到挫折，后黨主和派反倒趁機而起，逐漸掌握了對日方針的決策權。在甲午戰爭期間的帝后黨爭中，帝黨之所以最終走向失敗，於此可窺其端倪。

第二，戰爭期間清政府曾着力推行購船和練兵的計劃，為什麼後來都流產了呢？

此集翁氏文獻保存了相當數量的購船和練兵資料，過去皆未曾寓目，是第一次正式公布，所以彌覺珍貴。過去在有關論著中對甲午戰爭期間購船練兵問題基本不作論述，偶爾涉及，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限於表象，難知其中底蘊。此無關史家的問題，蓋史料闕如也。如今翁氏文獻的付梓，使人們深入瞭解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購船練兵計劃未能貫徹的來龍去脈成爲可能。

先說購船問題。翁同龢摘錄上諭稱：

光緒十七年四月，戶部因部庫空虛，議籌補五條，有旨是月起停購外洋船炮二年……二十年四月初一海軍衙門奉旨：褚成博奏交該衙門妥籌酌辦。

覆奏內稱：如有必須購自外洋之船隻炮械，無論何項物件，均須遵照定章請旨，俟核准後再行知照南北洋大臣轉咨出使大臣照章核辦。